

## ■玉渊杂谭

作家叶开最近所编的《这才是最好的语文书》在网上上架3天就将首印的2万册售罄,即便叶开自己想买,也处于无货状态。

沉默的“语文界”,最近因为这样一套“霸气”的民间课本起了微澜。但除却叶开作家的身份以外,我更愿意将此看成是一个家长的勇敢之举。因为让他不愿沉默,甚至愤而“反抗”的最初源头,就是看到女儿书包里那一册在他看来无法忍受的语文书。

这个作家父亲的孤独之举,起码有三个效应,他告诉人们,第一,不要忽视语文,第二,语文教材很重要,第三,家长不是没有力量的。

可能我们的任何一个教育问题,都无法绝对孤立去看待和修复,在应试思维的统帅下,任何环节都不可能健康。不过语文教育还是可以单拿出来说一说。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文学的教育,但又

## ■桂下漫笔

说起老清华,人们或许会想到大名鼎鼎的国学院。对于“国情普查研究所”,可能就有点陌生了。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38年8月,是当时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所”之一,是唯一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陈达,浙江余杭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近代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也是近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陈达出身农家,个性沉稳,儿时余杭高等小学读书,他家境一般,但勤奋好学。他说,“由于我家里穷,用钱很少。书我不买,借图书馆的看,学校必须交的费用,我家里也供不起,就靠我自己替人抄抄写写,搞点翻译,弄些收入来解决。”1911年,考上旅美预备班。当年清华学堂在浙江共录12名,陈达名列榜首。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吴宓、汤用彤等人。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任教。

陈达常说,自己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这一点很像他的老乡章太炎。抗战前,在清华园里,

## 起来,不愿做“顺民”的家长

文·句艳华

不仅仅是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它是最基本的人文教育、思想教育和心灵教育,是真善美的教育。一个人从启蒙到人生走向终点,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和这些内容相关。如果进一步去放大语文教育的意义,我看如今所谓的“素质教育”不足,人口素质不高,读书气氛不够浓厚等等,都和语文教育的“弱势”有关。

最近和几个朋友聊到中文专业的人最适合干什么,一个朋友淡淡说了一句:其他我不说,我看孩子最需要的是一个学中文的母亲。我想,这或许是对中文女生最为高贵的赞誉了。语文对人,对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有此一句,似乎已无需再多说了。

回到语文教材的问题上。不少人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语文教育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教育,假如仅仅依靠课堂,就是狭隘的,而且语文教育的不足,完全可以用大量的阅读去弥补。此言不差,

作家很少是由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似乎就证明了这个道理。但语文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培养作家,首先或者根本的含义除了扫盲外,是让发育阶段的孩子们明白“人”的含义。一本在教室里被拿来诵读、精研的教材,无论如何无法代替,又那么意义重大。教材是文本,也应该是语文教育之本。一本充满意识形态渗透和对原文进行拙劣修改的语文书,一篇无法张弛母语的韵律节奏之美,无法让学生大脑空间扩张的课文,就不配让孩子们对语文产生热爱,更是对他们享受语文之美权利的破坏。我常常记得中学语文老师每次翻到每一单元那一篇“凑数”的课文就先是一叹一口气,然后一翻而过的神态,——或许糟糕的教材伤害到的不仅仅是学生。即便是他们,又如何不被那些平庸无趣的文章腐蚀掉激情?

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和家的关系有时候也

更加密切。多年来,尽管家长们一般都对教育体制不满,发出各种各样的牢骚,但在执行环节上并不能有什么“作为”。没有一个家长看到一个落魄的成绩会高兴得起来,也更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为了反叛教育而放弃考试的独木桥,从而增加沦为“屌丝”的风险,或者选择宇宙最强的蓝翔技校。在应试面前,多数家长还是“默默”配合,做个“顺民”。

叶开自己说,想做一个《冰河世纪》中的那枚坚果,砸在貌似语文教育坚不可摧的冰崖上,我倒觉得,他同样也是家长中的一枚坚果,砸在了他们集体沉默的冰崖上,虽然只有一个浅浅的小坑,但这个坑,其实也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无数的父亲母亲们,不要再做顺民啦,孩子是自己的,你愿意让他日后成功却不幸福,活跃却不丰富,只有头脑没有情怀吗?其实你们很强大。

## ■乐享悦读

文·严杰夫

## 近世琴人的“清明上河图”



中华书局出版 严晓星著

文·胡一峰

院校系调整。社会学不再独立建制,社会学家们如同被强拆了房子的孩子,寄寓到别的学科。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是苏联专家主持的。陈达,这位中国人口普查的开创者被抛之脑后,只有个别人员就一些调查方法私下向陈达请教。1957年,陈达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成了“右派”。1975年,去世。

行文至此,或许我们应该再看看今日之呈贡,陈达昔日耕耘的国家现代化的“试验田”。在“百度”键入“呈贡”二字,却看到报道说,该地正在变成一座“空城”“鬼城”。而陈达昔日就读的小学,经历了“余杭县立太炎中心小学”(1935年)、“国民学校”(1946年)、“余杭县余杭镇工业系统五七学校”(1963年)等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改为“太炎小学”。这些图景交织在一起,渲染出近代以来中国在“古今中西”交织中跋涉前行的艰辛。而陈达这个一生牵挂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学者,仿佛正拄着手杖,扛着心爱的鱼竿,在烟云深处渐行渐远……

他的生活三点一线:在家中吃饭睡觉、在图书馆读书研究,在体育馆锻炼和洗澡。学校里的会议,照例不参加,没有必要的事情,照例不拜朋友,家里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太。他的朋友和同事李景汉说,“陈先生平时不大和我们交往,他老是躲在图书馆里忙他的”。学校南迁昆明后,陈达继续保持自己的生活风格。除了读书、上课、写文章,陈达的休闲只有种菜和钓鱼,他在文庙后园整理了多块菜地,种上冬苋菜、白薯、萝卜、西红柿、刀豆、洋芋、茄子和辣椒;每个周末,他都去郊外钓鱼,并在日记中详细记录战绩,某天,他无得意地记下,钓到了“汪刺”。这是余杭人的叫法,也就是北方的“嘎鱼”,湖南人所谓“黄鸭叫”,是一种肉质鲜美的鱼。

国情普查研究所原在昆明青云街169号办公,后因敌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在这座古老的文庙中,陈达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了中国现代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有人说,人口普查对于行政没有

意义。在战乱之中,这种说法看似有理。但陈达看得更远。战争,究非社会常态。战争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依然会面临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命题。一国的强弱贫富,可以从全国人口的社会状况表现出来。全面、科学地掌握人口情况,无疑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陈达认为,人口普查对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均有重要贡献。民主政治的选举,往往以人数为标准,政府征税也需要人数为根据。而这些,在我国均缺乏精确的统计和报告。而且,在国难深重的当下,人口问题尤关紧要,壮丁选拔、兵士数目、保甲编制,均须依赖可靠的人口统计,乃至于食粮的产量与运销,矿产资源的利用也均与人口普查有关。在《现代中国人口》中,陈达简练而深刻地阐明了他所作工作的意义,“希望这种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

可惜,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走得并不顺畅,全国人口普查真正实现,已是1953年了。当时,经过高

## 从唐朝空运的木笔花

文·王太生

木笔,尖如毛笔头,又称辛夷。早春,花绽枝头,初苞长半寸许,及至花开似莲,小如盏,紫苞红焰,吐蕊与兰花香,木有清气。

屈原《九歌》中,山鬼坐在赤豹拉的辛夷车上,后面跟着毛色斑驳的狸猫,衣袂罗裙,长发飘飘。辛夷车,在早春的山道上“嘎吱”行走,缀满紫色盈盈的木笔花,临风飒飒,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花车了。

远古的美人花车,木质车轴,内心花瓣般舒展的冷艳奢华,车上缀满沉静幽情的紫色花,似有“叮当”碰撞的金属清音。

与古花相识,是种缘分。我的朋友,诗人刘小三写过一首诗,“你先含苞成一枝笔,然后手腕一转,就批准春天和爱情啊。”刘小三站在树下,仰望木笔花,流露出诗人少有的天真。

木笔是一味中药,通鼻塞,治头痛。干燥的花蕾,存放在一格一格香气氤氲的中药铺里。刘小三有鼻炎,那是他20年前为追一个木笔花一样漂亮的姑娘,淋一场雨感冒落下的病根。每年春天,花粉传播的季节,除了写诗让他兴奋,鼻炎也让刘小三不停兴奋地打喷嚏。刘小三从古书上找来药方,采几朵木笔花,煮鸡蛋吃。吃过木笔鸡蛋,一个诗人嗅觉敏感的鼻子,安静多了。

刘小三有一个奢侈的梦想,想在乡下买块地,翻一间房,房子周围种木笔树,真正进入木笔花的花意语境。刘小三已经想好了,给这间房起一个名字:木笔居,他本人就是木笔居士。

古花,不知道抚慰过谁的眼神?白居易的“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香气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写的是木笔花。看着红尘中的花蕊,素洁纯净,连寺庙里出家的和尚都后悔了,人间还是红尘好。

看古花,在旧花瓶上,看细细密密的工笔画,几枝苞芽,凝固在旧时光里。也可以在泛黄的宣纸上,那些嗅不到芳味的花,在知名或无名的笔下,只朝着同一个方向,遥不可及。

木笔,就像古人解甲归田,隐逸民间。唐代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空寂的山中,溪边一篷茅小屋,花间人影,主人不知去哪儿了?其华灼灼,兀自开落。

花非花,花似花。木笔是名,辛夷是字,它还注册了一个现代网名:紫色玉兰。

在时间枝头流转千年,木笔的种籽,从诗经青卷,跌落到今世凡尘,经过多少飞鸟的流光接力?不为人知的旧名,是脱离了原先的氛围,缺少了彼时,彼景,彼人的意蕴烘托,木笔还是紫色玉兰吗?

有一天晚上,刘小三喝醉后,给我打电话念古诗,“春雨润窗纱,辛夷弄影斜,曾窥江梦彩,笔笔忽生花。”刘小三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快!在网上赶快下单,帮我订购几朵,从唐朝空运的木笔花。刘小三恍若听到,有一架大飞机,轰鸣着,给他送花来了。



## ■自然笔记

虽知颐和园西堤是仿西湖苏堤而建,多次前往却未能体会出江南烟雨的柔和感,毕竟北方的山水更俊朗些。没曾想,山桃花开时,整条西堤上粉桃夹烟柳,六座各具特色的桥隐约出现在青青的柳色和粉粉的桃花海里,让人仿佛置身于朦胧的西湖。再熟悉的地方,在不同的时候总能发现全新的美。

年高绘

## ■流年记忆

## 北京西站南广场东

文·唐加文

23年前某个清新的夏天,我一个人拎着一个大绿皮箱子,从同样颜色的火车中钻出,穿过西站破旧的站台、斑驳的栏杆,穿过路边的臭豆腐摊子和争抢生意的三轮车夫,一路晃啊,晃啊,犹如朝圣般奔向了的大学。

16年过去了,我从北京晃到哥根廷,又从那边晃了回来。生命中支离的片段像老西站那斑驳的栏杆,执拗而随意地串在一起,连成一片,像一部电影放映机,吱吱呀呀地讲述着生命的精彩与无奈。刚上大学前几年,还喜欢回家。于是在寒暑假,仍能满怀热望地挤进西站的人群中,与返乡的民工兄弟们挤进复古风格的硬座车厢,可能全国最慢的绿皮火车带着返乡的大军走走停停,三四千里的路程常要走五六个小时,车厢里成分复杂的味道,满地或靠或躺的人群在轰隆隆中合力演奏着呼啸和叫喊的交响曲。

有了热恋的女朋友,对回家不再那么渴望,不得不回时,便是“儿女泪沾巾”的场景。某年雨季,女友送我到西站,在泥泞而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刮坏了鞋子,西站随处可见的水坑让她寸步难行。于是在近处买了一双60元的凉鞋给她。这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片段,但我会告诉你,当时的我全身只剩下90元了吗?而回家的大巴还要30元,我会告诉你因为无线再支付打车费下大巴后又须步行十公里吗?

女朋友后来成了爱人,像所有女人一样,她的鞋子数量一直在急速增长而永远缺少,但我们唯一共同记得的,仍然是那双60元钱不起眼的鞋子。再后来,我南下追逐那不靠谱的梦想,和我那被戏

称为“京城三少”的朋友在厦门环岛路边放歌纵酒,梦里时常闪过北京。

不由得想起我的一个同学。大二时,他的生活就像一个乱七八糟的调色板——逃课、玩游戏、喝酒和校外女生恋爱。颓废、不求上进。暑假,女友邀他与同学们集体旅游,他登上了开往九寨沟的列车。车上人满为患,他们只买到两张卧铺票。大家只好轮换去休息。余下的就在硬座车厢里打扑克,玩得亦乐乎。

凌晨三点,他和女友带着浓浓的困意去卧铺车厢休息。人太多,走廊里挤满了人,有好多农民工模样的人头枕在编织袋上,昏昏沉沉地进入梦乡。在一节车厢的连接处,他忽然像针扎一样大声叫起来,只见他的父亲躺在角落里,背倚着包裹,微仰着头睡着了。世界很大,有时却又很小。

父亲也大吃一惊,说他是去重庆的建筑队干活。父亲问他去哪里,他嗫嚅着说出行程。意外的是父亲却鼓励了他,年轻人就该这样,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想到亮红灯的功课,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父亲从不在他面前诉说生活的苦,他也很少想过父亲的付出。现在,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列车上,看着年老的他背着行李外出做工,他心里涌起一种难言的酸涩。那晚,父亲在他的卧铺位上睡得很香。送父亲下车后,他发现自己的口袋里多了200元钱,两张皱皱巴巴、浸着汗渍的钞票,让他觉得沉重、烫手。他忽然就没有了兴致。从风景区回来时,他在父亲打工的城市下了车。

天闷热得像个大蒸笼,暑气滚滚。在郊外的建

筑工地,他见到了父亲。父亲正踩着用木板搭起的脚手架,叮叮当当地捆扎钢筋。父亲心疼地责备他为什么来。看着父亲湿透的汗衫,被暑热熏得黑红的脸膛,他只觉着嗓子发堵。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从他脸上滑下,流进嘴里,咸涩的苦。正说着话,有工友从身边走过。父亲自豪地介绍,这是俺儿子的儿子。那工友又问在学校学的啥。念的是核物理,父亲大声回答。

他在工地呆了两天,才知道那天父亲在火车上把仅有的钱都留给了她,现在的生活费是拿工钱代扣的。天气那么热,每天强体力的劳动,简单、粗糙的饭菜就是父亲全部的生活内容。

他突然发现:这些年他忘记了自己的来处。父亲烈日下的汗水滴滴在他心里,唤醒了沉睡的心。从此,他立地成佛。

前些年,西站拆了重建,没有了三轮车夫,没有了凹凸的地面,没有了绿皮火车。再后来,我回到清华园,高大巍峨的新西站也日益变得“高大上”,速度奇快的高铁成了优选的工具,然而神奇的是,我每次经过北京西站南广场东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机灵一下,西站与我失散多年后再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搭建起微妙的联系。现在,我们所谓的“京城三少”重聚北京。喝着豆汁儿,吃着卤煮和炒肝儿我们感慨万千:有坚守、有放逐、有迷茫,与多年前一样却又大不一样。我默默地想,生命中有些历久弥坚的东西终将出现,有时它们会暂时黯淡,像北京西站一样,但这不代表着不知名的小草没有春天?

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比如友情。